

中国 现代医学传略

ZHONGGUO
XIANDAI
YIXUEJIA
ZHUANLUE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现代医学传略

李向明 陈光曼 编
王瑞廷 辛翠兰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4

0524.1

中国现代医学传略

李向明等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72千字

1984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470册

科技新书目: 63—39

统一书号: 14176·124 定价: 1.50元

《中国现代医药家传略》一书的问世，
是我国医药卫生界的一件好事。它从一个
侧面概括地反映了现代医药科学
与发展的进程。

医药家所为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
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是应该受到称
赞的。解放以来我国老中青医药人
才辈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希望今后
继续编辑出版，以鼓励我国广大医
药卫生人员向他进军。

徐月卿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前 言

为了搜集、整理我国著名的中西医学专家的经验 and 成就，向中外介绍他们的主要业绩和重大贡献，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事业，我们编辑了《中国现代医学传略》。本书共编入了五十一位中西医学专家的传略。书中扼要地介绍了他们走上学医道路的经过、成功的经验以及在我国现代医学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供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特别是年青一代学习和借鉴。

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不少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的传记未能收入本书。这些同志的经验和业绩，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比较仓促，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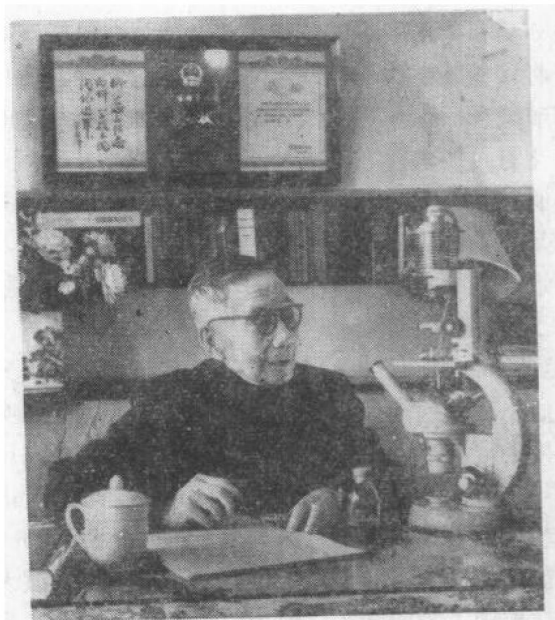
目 录

和细菌打交道的人——余 赟	(1)
著名微生物免疫学家谢毓晋	(7)
微生物学家李河民	(15)
生物化学专家梁植权	(20)
病理学专家白希清教授	(26)
临床内分泌学家朱宪彝	(30)
中医信赖的带头人——吕炳奎	(38)
名中医冉雪峰	(43)
一代名医施今墨	(48)
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	(56)
中医内科学家姜春华	(63)
著名中医内科教授——邓铁涛	(70)
中医内科教授董建华	(77)
中医内科学家董德懋	(84)
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做出贡献的外科专家吴咸中	(90)
著名内科学教授张孝骞	(96)
著名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教授	(103)
著名内科学、内分泌学专家卞安堃	(113)
内科专家王权威	(122)
著名心脏内科专家陶寿淇教授	(128)
心血管病专家陈可冀	(135)
外科专家兰锡纯	(141)
著名外科专家傅培彬教授	(147)
胸外科专家辛育龄	(160)
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	(165)

烧伤学教授杨之骏·····	(171)
成形外科教授朱洪荫·····	(175)
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	(180)
骨科专家冯传汉教授·····	(186)
骨伤科专家尙天裕教授·····	(189)
著名骨伤科专家叶衍庆教授·····	(197)
著名麻醉学教授谢荣·····	(202)
著名皮外科中医赵炳南教授·····	(211)
皮肤病专家马海德·····	(220)
皮肤科专家杨国亮·····	(227)
中外闻名的皮科专家胡传揆教授·····	(231)
妇科专家于载畿·····	(238)
妇科专家郭泉清·····	(245)
儿科专家郭迪·····	(250)
著名耳鼻喉科专家吴学愚教授·····	(254)
著名眼科专家郭秉宽教授·····	(264)
眼科专家陈耀真·····	(271)
放射科教授胡懋华·····	(276)
医务界的前辈、公共卫生学专家金宝善教授·····	(280)
环境卫生学教授杨铭鼎·····	(287)
著名传染病学专家戴自英教授·····	(294)
预防医学专家蔡宏道·····	(302)
药用植物学家肖培根·····	(305)
“护士奶奶”余韞珠·····	(209)
儿科护理专家王懿·····	(313)
护理学专家王琇瑛·····	(319)

和细菌打交道的人——余瀛

余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专家，他和细菌打交道至今已整整六十年，在研究、利用、改造细菌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1980年他被世界各国著名免疫学家推选为国际免疫药理学会创始人之一。



余瀛1978年在做实验小结

—

余瀛原籍浙江绍兴，1903年5月生于北京。他在中学三年级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学生的游行行

列。为了早日成材，拯救危难中的祖国，他于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学院前身）。

在学习期间，他除了勤奋攻读专业课外，还在北京《晨报》编辑孙伏园的鼓励下，为该报翻译了多篇国外有关卫生常识的文章，后由《晨报》出版社汇集出版，书名为《妇女的健康》，这是余演最早的译著。

1923年，余演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因为他会英文，被介绍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科进修，后任助教。他在细菌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分离和纯化破伤风芽胞杆菌，就是在显微镜观察下，用毛细玻璃管将培养液中的单个细菌吸出来进行培养，这样就可以从一个细菌繁殖纯种后代。这个试验是个非常细致而耐心的工作，在多次失败中才有可能求得一次成功。

1927年他被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教授秦赛尔处进修。秦赛尔是举世闻名的细菌学家，他有着广博的知识，能读多种外文。他一走进实验室就忘掉了一切。这种缜密严肃的科学作风，给余演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余演初到哈佛大学时即做秦赛尔的助手，帮助他研究《风湿热的病因》。他从许多病人血液中培养链球菌进行研究，实验结果经过秦赛尔教授的分析，写出了《风湿热的细菌学及变态反应学说》一文，1928年在美国内科学杂志发表后，逐步为后人所证实。在与秦赛尔教授朝夕共处的日子里，秦赛尔教授时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有一天余演大胆地提出了解决“白喉带菌人的问题”。因为白喉虽然已有抗毒素的特效疗法，但有人病愈后，长期带菌，仍然是一个传染源。要消灭带菌，可能需要抗菌物质。秦赛尔教授完全同意他的推论，并让他去做“白喉菌变异性的研究”。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区别开抗菌与抗毒的机制，而且证明了只有抗菌的东西，才能促使白喉菌发生变异。在秦赛尔教授的提议下，《白喉杆菌的变异性》一文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经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审批委员会通过，授予他哈佛

大学卫生学（细菌学专业）博士学位。当时秦赛尔要求他留在哈佛大学，但他一心向往自己的祖国。1929年秋，余赓怀着欣喜而又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秦教授，在英、法、德进行短暂参观后回到了北京。

二

回国后，他担任了北大医学院教授，同时兼任中央防疫处技正。他和秦赛尔教授的另一名中国学生汤飞凡合译了秦师的巨著：《秦氏细菌学》。这是一本极有名望的专著，早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这次中文译本是我国第一本细菌学译著，于1930年出版。

1933年余赓的第一部专业书《病源学》出版，同年他被邀请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担任细菌血清学主任。这个研究院设备齐全，条件良好，成为他一生中专注于医学科研的重要场所。他在这期间发表的《上海霍乱弧菌的研究》，用详尽的科研材料，大量的实验数据，驳斥了外国学者关于上海是霍乱发源地的错误观点，指出上海霍乱病的流行是由国外传入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指出了防治霍乱的办法，即严格进行海港检疫。后来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伤寒病的血清疗法。由于当时抗菌素和黄胺药尚未问世，伤寒病的死亡率相当高。他从伤寒杆菌Vi抗原的研究中制造出有效的抗菌血清，成为当时治疗伤寒病的最好制剂。他曾写出多篇伤寒热血清治疗论文，分别在英国及国内医学刊物上发表。

1939年英国李斯德研究院菲利克斯博士邀他去英进行伤寒热的科学研究，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未能成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被迫关闭，于是他在上海设立了医学化验所。在战争年月，他除了为病人做些医学化验，再也无法进行科研工作。这对他的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当时，汪伪政府鉴于余赓的名望，曾派人到上海委以要职，被他严词拒绝。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余瀛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北京为长期过着戎马生活的中央领导同志检查身体。其间，他多次聆听周总理的亲切教导，从而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朝鲜战争发生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反细菌战工作。华东卫生部曾派他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监制预防鼠疫等的生物制品。1952年9月24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绝不允许利用科学残害人类》的文章，揭露和痛斥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的阴谋与罪行。

三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余瀛服从党的安排，到上海第二医学院任细菌学教研室主任，从此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教学。1954年卫生部召开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大纲编写会议，委任他主持讨论医学微生物学教学大纲。在讨论会上虽然有少数人主张全盘苏化，但多数教师坚持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编写教学大纲与教材。经卫生部批准，他主编了全国试用医学微生物学教学大纲和教材。自此以后，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用的《医学微生物学》一书，一直由他主编（十年动乱期间各校临时编的教材除外），对培养全国医学人才起到了重大作用。

1958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抢救大面积灼伤病人——钢铁战士邱财康——获得成功。这一奇迹曾经轰动全国。但在抢救过程中，病人的大腿发生了严重的绿脓杆菌感染，病情急剧恶化。在功败垂成之际，有人提出立即锯腿以保全生命，但院党委认为非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不能使病人终身残废。在各种抗菌素和全部抢救措施失效后的紧要关头，余瀛提出：在自然界中，每一种细菌都有自己的天敌，称为“噬菌体”，这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专门吃掉与它相应的细菌。如果能够找到这种特殊的“噬菌体”，定能控制住邱财康的感染。接着，院党委发动许多学生和微生物教研

室的老师四出寻找，并终于在郊区粪池采集的标本中，找到了和邱财康大腿上的绿脓杆菌相应的“噬菌体”。经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大罐培养生产的大量“噬菌体”，吃掉了病人大腿上的绿脓杆菌，邱财康的生命得到了保全。这一奇迹使余瀛终生难忘，也使他深切体会到，知识分子的知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五十年代，国内每年患麻疹的儿童非常多，由于麻疹合并肺炎而死亡的儿童，估计每年至少有十万，因此防治麻疹是当时医学界的一个重点课题。在1956年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上，余瀛受哈佛大学恩德司博士研究预防麻疹的减毒活疫苗的启发，提出了一个题为《研究并试制预防麻疹的减毒活疫苗》的提案，得到大会的批准。在余瀛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及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麻疹减毒活疫苗不久在国内试制成功，试用一年即大见成效。这一科研成果至今还在国内采用，使千百万儿童幸免于因麻疹而夭折。

四

在多年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余瀛深深体会到学习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性。他于六十年代初参加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并发表过《微生物与机体》等多篇学习体会文章。因此，他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方向。这对于保证他事业上的成功，起了极大的作用。

七十年代，作为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免疫学在国际上有了重大突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广泛地影响到医学基础及临床各科的发展。1971年，他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免疫学的研究中去。他拖着年近古稀的病弱之躯，四出奔走，搜集资料，决心追回失去的时光，使我国免疫学研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他的倡导下，上海第二医学院基础医学部成立了全国第一

个免疫研究室。他倡议应用“转移因子”来提高人体的细胞免疫，经临床实践，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1978年，余瀛发表《肿瘤病人的免疫调整》一文，提出：肿瘤病人是由于免疫力差造成肿瘤细胞在体内繁殖，调整病人的免疫功能，用中草药和西药促进人的免疫力，随时消灭开始癌变的细胞，是防治肿瘤的新途径。同年4月，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得奖状。

由于免疫学的飞跃发展，七十年代全国各医学院及各省、市、自治区大医院纷纷成立免疫研究室，全国医学界很快掀起了“免疫热”。在这一热潮中，上海市免疫研究所于1979年5月成立，余瀛任所长。该所设有基础免疫、临床免疫等七个室，重点是免疫遗传与免疫调节两方面。在免疫调节方面，他们首创正常人转移因子联合抽提方法，在临床实验中总结了七百余例，证明转移因子确能增强病人的细胞免疫，对病毒及真菌感染病人有明显疗效。正常人转移因子已通过鉴定，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正式生产。在遗传方面首先要建立中国人白细胞分型，并于1980年5月被批准为世界卫生组织免疫遗传学合作中心。

从1978年开始，余瀛开始招收免疫学研究生，这些学生经过三年多的学习，已全部通过硕士论文的答辩，其中不少论文填补了国内空白。1981年，他又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

由于余瀛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医学界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高度推崇和重视。他现在担任的主要职务还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及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编委会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

著名微生物免疫学家谢毓晋

谢毓晋是微生物免疫学家、一级教授、一等一级卫生技术人员，江苏苏州人，1913年8月26日生于北京。193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次年一月赴德国富来堡大学医学院就学，从师著名微生物学家乌伦赫特教授和武尔姆博士（Geheimrat Prof. Dr. P. Uhlenhuth, Dozent Dr. K. Wurm）进行研究工作，1939年8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任富来堡大学（Freiburg Br.）内科医院细菌血清室代理主任。1940年应聘去布拉格德国大学医院任细菌血清检验科主任。1941年5月回国参加抗战，在兰州任卫生署西北防疫处技正。1942年12月以后转任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医学院教授、免疫学研究所所长兼医学院院长。这一年，他和一些医学家一起创办了《大众医学》。解放后，他一直在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任职，历任总技师、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兼任武汉医学院教授。

谢毓晋教授从事微生物免疫学的教学和研究四十余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免疫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谘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预防医学专业组成员、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副会长。他还被选为第二、三届武汉市人民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谢毓晋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满清时代从京师大学专科毕业后，先后在清朝邮传部和辛亥革命后的交通部任职。父亲为人正直，知识渊博，熟读古文，遍阅史书，使他不仅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还养成了在任何困难下百折

不挠的毅力。16岁那年，他离开北京师大附中，随家迁回原籍苏州，在东吴大学附中就读。当时，时局动荡，内战不已，父亲饱尝国难之苦，深信“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全力支持子女攻读自然科学。

在父亲“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谢毓晋接受了“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古训。不久，他哥哥患肺结核去世，妹妹又染罹肺结核，当时还没有特效药，中西医治疗都不见效，这件事给他很大的刺激。谢毓晋原来想读临床医学，现在认识到学临床医学，毕业后开业，收入虽丰，受人尊重，但一次只能治好一个病人。医术再好，没有好的特效药去对付侵袭人体的各种病菌，也只能眼睁睁地望着重病人一个一个离开人世。谢毓晋决定放弃临床医学，走著名微生物免疫学家科克(Robert Koch)、帕斯德(Louis Pasteur)和贝林(Emit V. Behring)的道路，到实验室去研究威胁千百万人健康的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问题。

1932年，他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实现了从医的愿望。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组织才干出众，很快就被同学们选为同济医学会和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参加了要求政府收复东北失地的赴南京请愿活动，主持举办了轰动上海医学界的、内容十分丰富的解剖学展览会。193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医学院前期。

1937年1月，他和几位同班同学远渡重洋，前往西德富来堡大学医学院自费进修医学。边选课学习，边作研究工作。他学习异常勤奋，经常在课余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和细菌、血清、试管、实验动物打交道。当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使中国的半壁大好河山沦为殖民地，谢毓晋的父母弟妹被迫逃难他乡。他的经济来源被断绝了。但是，他经受了学习、研究和生活上的艰苦锻炼，仍然坚持忘我的学习和实验。一天深夜十二点多钟了，他的导师路过实验室，看见谢毓晋还在全神贯注地为小白鼠进行实验治疗注射。在一缸缸的小白鼠旁，放着两本刚出版的医学杂志，一杯冷水和一块咬过几口的黑面包。导师赞许地微笑着，一言不发地走

了。不久，他获得了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奖学金。由于他专心致志，思维敏捷，在三年的时间里就修完了学业，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谢毓晋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在德国著名的《免疫研究与实验治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实验研究论文：1. 链球菌与葡萄球菌实验感染血清学治疗的免疫学基础 (Zeitschrift für Immunitätsforschung Bd 96, 361—396, 1939); 2. 磺胺药物对溶血性链球菌实验传染疗效与疗效机制研究 (Zeitschrift für Immunitätsforschung Bd 98, 220—250, 1940); 3. 青蛙、水蛙与蟾蜍亲族关系问题的免疫生物学研究 (Zeitschrift für Immunitätsforschung Bd 98, 330—344, 1940); 4. 粘液性荚膜杆菌的化学实验治疗研究 (Zeitschrift für Immunitätsforschung Bd. 101, 80—101, 1942)，受到了德国免疫学界的重视。1941年又在著名的《德国医学周刊》(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324, 1941)上发表了他在国际上首先发现的磺胺药物对福氏杆菌传染的治疗作用，受到了欧洲实验治疗学界的重视。经过导师的推荐，刚刚获得学位的谢毓晋担任了富来堡大学内科医院细菌血清室代理主任。

谢毓晋出色的学术成就，是和他的导师言传身教与严格要求分不开的。初学不久的一天晚上，他拿着排满了试管的试管架，去向乌伦赫特教授汇报实验结果。年近八十的老教授取下老花眼镜，看了看，缓缓地问谢毓晋：“对照管在哪里？”当他发现没有作对照管时，就狠狠地批评教育了谢毓晋一顿，强调了客观对待科学实验的重要性。然后，这位著名的微生物家和蔼地拍着学生的肩膀，把满脸通红的谢毓晋送了出來。从此，谢毓晋在微生物免疫学研究的'工作中，一直恪守了严格的、客观的、进行科学实验设计、实验、总结与论证的方法。

他珍惜在德国的学习时间，力求多从德国著名学者那里，吸取教益。不久，他离开了富来堡，前往柏林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Ro-

brte Koch Institut, Berlin) 和马堡贝林研究所 (Behring Institut, Marburg/Lahn), 从师当时的一些著名的微生物免疫学教授, 进修沙门氏菌血清学诊断、狂犬病预防研究、结核菌免疫研究和血清学工作方法。随后他被聘为布拉格德国大学内科医院细菌血清检验科主任。在完成日常工作之外, 埋头于实验研究工作。

1941年5月, 中国驻德大使馆转来国内卫生署的电报, 调谢毓晋回国参加抗日后方的防疫工作。他想到伤寒、霍乱、白喉、斑疹伤寒等传染病象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侵袭着苦难的同胞, 心情沉重, 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 放弃了“讲师考试”、走德国大学教授职业途径的机会, 返回祖国。

他来到了兰州, 被任命为卫生署西北防疫处技正。在那一年半的工作里, 他看不惯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 自己的抱负也不能有所发展。使他感到安慰的是, 在这里他与一位苏州姑娘江能霞结为终身伴侣。她成为他几十年科学生涯中的得力内助。

1942年12月, 他离开兰州, 回到当时因抗战迁到四川宜宾的母校——同济大学医学院任细菌学教授兼细菌学馆主任。这一年, 他才29岁。当时, 学院里有少数人觉得他太年轻, 瞧不起他, 在他第一堂课时, 请了一些人前来评议。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的一天, 大课堂里座无虚席。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 空着手走上讲台, 当他用流利的德语讲完课时, 获得了学生的拥护。不少人说: “学院出了个人才!” 两年后, 他获得了教育部审定的教授证书。后来, 谢毓晋又转任上海医学院教授。他对提高这两所医学院的微生物免疫学科的教学水平作出了努力。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 35岁的谢毓晋受聘担任了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免疫研究所所长。当时, 医学院搬回上海不久, 教育质量比抗战前显著下降。谢毓晋冲破老同济的医学派别成见, 亲自到各地聘请包括所谓英、美、德、日各派的医学教授。在教学中, 他注重医学基础课的实习, 相继在前期开设了解剖学实习课, 后期设置了病理解剖室。在困难的情况下, 补充了一些教学设备, 千方百